

高密度校园中的另类空间

Other Space in High Density Campus Environment

■ 王伯伟 ■ Wang Bowei

[摘要] 高密度已成为目前我国部分大学校园的显著特征之一。本文借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另类空间”观点,提出必须从校园使用者的生理需求、区域文化认同感及文化变异三个角度出发来解决高密度校园中空间与使用的矛盾,并以同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的设计为例,对另类空间作了进一步阐释。

[关键词] 高密度 另类空间(异托邦) 并置 邻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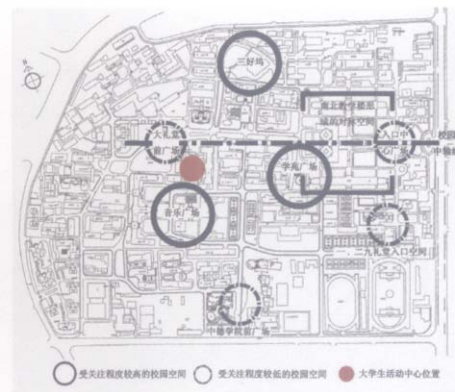
[Abstract] High dens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some university campus in China. As for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uses the French philosopher--Michel Foucault's view of "other space" to propose that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space and its utilization we must think over three points: the user's physiological needs,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hanges of culture in the society. The paper further explains what other space mean through the example of the design of the Students' Activity Center in Tongji University.

[Key words] High Density, Heterotopias, Juxtaposition, Proximity

人口密度是城市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而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大学校园也涉及人员密度的问题,按照国内新校区规划设计经常采用的“人均一分地”的控制指标计算,校园内的人员密度已达 1.5 万人/平方公里,与一般城市的中心区相当。近年来,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位于市区内的学校由于受用地所限,其人员密度远远高于这一指标。以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为例,目前该校区人口密度已达 3.6 万人/平方公里^①,几乎与上海中心城区相当。虽然目前尚无关于高密度校园衡量参数的定论,但是可以通过将大学与所在城市作比较来建立一定的参照关系。如果校园内人员密度已接近或者超过所在城市高密度区域,那么它应被视为高密度校园。

之所以要将校园与城市作比较是因为任何一个城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会以一套文化方式来解决其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类似于人口密度这样重要的环境生存条件,城市总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那么当校园建设同样面临高密度的困境时,是否应当向城市多多学习,使校园更加融合于城市的环境之中,抑或是相反,更加强调校园自身的独特形态?这不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它取决于城市与学校之间更为本质的属性差别。文化哲学家们的研究使这种属性得以显现,其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一次题为《另类的空间》的演讲中,围绕人与空间的关系,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福柯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有一套关乎人与空间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决定人们如何认知空间、在空间中集结以及运用空间表达相互关系等的同时,也会发生变异。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类空间能够为这种变异提供场所,并将其建成某种构型(configuration),福柯称其为“异托邦”



1 同济大学校园公共空间意象点

(heterotopias, 也译为“另类空间”)。大学、医院、法院、监狱、寄宿制学校、墓地等,都是另类空间的例子。因为这些构型并非与生俱全的,而是伴随城市的发展逐渐形成、完善,并以其高度规划化的秩序持久地适应环境,进而对城市形态产生影响,甚至促成社会转型。福柯明确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套特定的关系当中,而正是这套关系,勾勒出那些设置的轮廓,这些设置不可彼此化约,并且绝对不可相互叠加^②。”换句话说,作为城市中另类空间的大学校园,即使在高密度的压力之下,也不会消解某些特定的秩序关系,但在其历史的进程中,却会以不同的空间形态发挥作用,这种变异的空间相对于主流空间而言,也是一种另类空间。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的公共空间形态演变就印证了上述观点。该校区公共空间的形态框架基本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强调将不同的功能空间与场所组成等级性的聚合:一条东西向的轴线强化了中心区的核心地位,中心广场位于轴线最神圣的位置,沿轴线布置的图书馆、大礼堂、毛泽东塑像以及对称的南、北教学楼,更强化了核心区域的等级与秩序。大学校园所特有的神圣与理性精神,通过要素的定位秩序得以显现(图 1)。

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该校区近十年内新建建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200092)
收稿日期:2007-02-23



筑已达二十多万平方米，几乎占有总量的三分之一，整个校区已颇为拥挤。中心广场虽然形态依旧，却愈发少有鲜活的公共使用，其实际功能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已成为校车班车的始发站与停靠场地，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就是这一变化无奈的见证者；与此同时，原本在校园中几处极为普通的场所，却成为高密度校园中公共活动最频繁、人流最集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一项专门的调查表明校园中最受欢迎的场所，并不是与时间的永恒性、累积性、纪念性有关的空间，而是与时间的短促性、频繁性与多变性相关的空间（表1）。高密度下的神圣位置（例如入口中心广场），即使空间宽敞，也未必能成为校园环境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外部空间；与此相反，诸如学苑广场（图2）、三好坞（图3）和音乐广场（图4）等几处颇具人气的场所，并不具有空间定位上的神圣感，却因为多样的功能配置、轻松的环境气氛、适宜的小气候条件乃至与校园大多数功能性场所的秩序截然相反的随意性而得到广泛认同。它们过滤了城市商业的喧闹与浮躁，同时有效地实现

了学术规训制度的完善与补偿。这类场所的形成不是通过强化要素的定位得以显现，而是被要素间的邻近性（proximity）的关系所界定的，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还会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人类去居住——这个问题当然是相当重要的，而且还要知道：在一个特定的处境下，为了实现一个特定的目的，应当优先采取人的要素的何种邻近关系……”，确切地说，在大学校园空间秩序的组织层面上，这类场所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异，它们是当代校园中的另类空间，而且正在成为现代大学校园最有生机的组成部分。

让我们回到对高密度下城市与校园形态关系的分析。对于城市发展而言，人口的高密度是一种危机，也是一种偏离。人类对于外界高密度产生的生理反应有一定规律，这是作为生物的人所共有的常量，因此，在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中，都会形成某种确定的另类空间形式来应对高密度导致的偏离（比如上海老城区的居民对于弄堂空间的利用）。当然，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区域中一个特定群体——大学生们对于高密度校园空间的适应方式，而其中的变异已经出现：空间的对立逐渐消除，被人们认同的公共空间并不是同质性的、空洞的；恰恰相反，这些场所具有各种功能性质，或许还蕴含着青年人的梦想，并可能成为激发校园文化活力的源泉之一，是校园中充满生机的另类空间。

由此看来，应对校园中的高密度问题，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变量——作为生物人的变量、作为文化人的变量以及作为大学特殊群体的变量。后者虽

然总是作为前者的一种偏离，以另类空间的方式而嵌套在前者之中，但也更应当被关注，因为它们将对其余的空间产生影响，“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作为完善的样板，供其他场所效仿^①”，换言之，高密度条件下的校园公共空间不该迷失自我，而更应当突出其在城市文化中的个性。

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设计了同济四平路校区新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基地位于学生生活区、教学区和体育活动区之间，几乎是校区的形态中心（图1），这也恰好符合校方的设想——以学生为本，让学生的课外活动场所成为公共活动的中心。但设计却刻意淡化其中心感——没有轴线、不设主入口、甚至不突出主体建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设计对并置性的强化，这正如福柯所说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关系的聚合，使这些要素显出同时并置、相互对峙、彼此牵连的样子^②”。

多个建筑形态的并置——活动中心的总建筑面积不到3500m²，其中1500m²为新建部分，由展示单元、茶座单元和连接单元组成，2000m²为旧办公楼改造而成。周边的锅炉房、水房和学生浴室都被当作围合空间的元素，其饰面材料也被设计加以引用（图5）。

多向活动流线的并置——设计除通过厅、堂等空间对活动中心内部流线进行合理组织外，更通过廊、桥、平台等形式将其外化，并对基地内原有的学生打开水的流线予以专门布置，使其直接穿越活动中心的连接部分（图6，图7）。

多种功能空间的并置——活动中心包含娱乐、

表1 2006年同济大学校园户外空间关注程度意象调查表

排序	名称	提及人数/被访人数
1	学苑广场（学苑食堂前广场）	48/48
2	三好坞	46/48
3	音乐广场（操场西侧）	44/48
4	入口广场（毛主席像）	18/48
5	一·二九礼堂入口空间	15/48
6	中德学院前广场	14/48
7	大礼堂前广场以及侧面的绿地（孔子像）	12/48
8	校园内的水道	11/48
9	教学楼旁边的修读场所	7/48

注：受访者可以有多个答案，所以提及人数总和超过被访人数总和



5 大学生活动中心的组成单元



6 学生的打水通道被保留



7 穿越建筑连接部分的通道



8 包容不同时间和室内外互相剪切的场所

休闲、展示、集会、心理咨询、社团活动、办公等功能空间，甚至还设有一个小型超市。

多种时间形态的并置——基地原有一处学生餐厅，曾为校园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将其拆除后，场地内留下了前、后两处门楼以及当中的一组屋架，它们与茶廊、桥、展示单元等共同围合形成一处略有下沉的广场；会议厅白色的外墙上将安置一个巨型屏幕。这组场地的主题取向不是永恒，而是校园生命的周期：过去的生活痕迹、定期开展的节庆聚

会，企望时空交错的片断能够在此不断闪现（图8）。

如此安排是否会让高密度校园中的师生们拥有一种别样的空间体验，还有待于使用者的检验。但是，我们相信：唯有努力使大学永远成为现代社会文明最重要的源泉，不断丰富其思想、智慧以及空间体验等，社会的梦才不会干涸。■

注释

①数据来源：同济大学档案，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占地1 023亩（68.2hm²），学生1.8万人，教职人员6千人。

②摘自米歇尔·福柯题为《另类的空间》的演讲，由李康翻译，详见：<http://www.cnbiyi.com/showtopic-175.aspx>。

注：硕士研究生徐欣主持了“校园公共空间使用状况”专项调研，硕士研究生施道红、李冬磊协助完成了同济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的施工图设计。